

对中国当前城市社会稳定性的实证研究

宋丽娜 Simon Appleton*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个人对其生活各个方面满意度的自我评定来测定中国城市社会的稳定性及其决定因素。本文使用的数据具有中国城市社会的代表性。本研究所得的主要结论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会降低人们的不满情绪,从而减轻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在收入可持续增长时,仅收入分配不均一项指标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给予人们一定的政治空间,鼓励人们提高社会与社区的参与意识亦会提高人们的满足感;良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会化解人们的不满情绪;在控制诸种可观察到的变量后,共产党员依然具有较高的满足感。

关键词 收入分配, 社会稳定, 满意指数

一、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的瞩目。然而世界对中国的信任并不充分。一个最普遍的担忧是,中国社会是否会长期稳定。一个通常的认知是,社会的稳定以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为依托;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全面地并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另一个可以普遍观察到的顾虑是,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国有部门改制之后所产生的较高失业率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Appleton *et al.*, 2002; Knight and Xue, 2006)。国有部门以单位为基础为职工提供的福利与保障也相继取消,或缩减其比例。迄今为止,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的不确定性仍然使人们对未来感到普遍不安(Saunders and Shang, 2001; Appleton *et al.*, 2004)。在诸种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中,目前最受关注的还是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根据 Li and Gustafsson (2003) 和 Knight and Song (2003) 的研究,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在 1988 至 1995 年间急剧上升。学者、评论界甚至决策界开始在近年内对收入分配问题十分关注。人们通常把聚众示威、武力械斗,甚至大大小小的刑事犯罪都看成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果(Tanner, 2004; Liu, 2005; 历年《中国法制统计年鉴》)。为了科学地验证中国社会是否会长期稳定,我们有必

* Nottingham University. 通讯作者及地址:宋丽娜(Lina S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ottingham University, Nottingham, NG7 2RD, United Kingdom; 电话:00-44-115-8466217; E-mail: lina.song@nottingham.ac.uk.

要首先界定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诸种因素。本文作者于2003年设立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的研究课题。这篇文章即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的目的是对中国城市本世纪初(2002年)的社会政治稳定性做出尝试性的实证分析。为了研究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决定因素,本文作者参考了多种学科文献,设计出一套相关指标,并将这套指标与“中国收入分配课题”(CHIP 2002)的经济与其他指标相结合,我们命名本文所用的这套指标为“观念2002”。本文所使用的统计样本是从全国12省的71个城市中抽出的7000名家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市样本筐)。应答者是从这些家庭中随机抽出的成年人(18岁以上)。

本文的结构为:第二节讨论本文所使用的概念定义以及对数据使用的方法;第三节解释本文所采用的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第四节和第五节分别用来讨论这两个模型所得出的结果;第六节做出结论。

二、概念定义以及对数据的使用方法

(一)对满意度(或指数)的界定

在比较宏观或广义的稳定性研究中,不稳定性是可以由反常行为来确定或度量的。这些行为包括抗议、示威、罢工、暴力、犯罪等;最为极端的例子,如兵变、政变或者革命。尽管用过激事件的发生频率可以很好地概括稳定性的社区或历史意义,然而事件发生的集体因素和偶然因素则会排斥社会中个人与事件关联的分析。而这种由个人特征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量具有极强的政策分析意义,将社会中个人对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反应作为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来进行分析并可以用此来调整政策。

本文所使用的社会稳定性是以个人对总体生活满意程度来界定的。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26组对个人“满意程度”有影响的方面,请回应者逐个对这些方面做出对五等尺度的满意程度的选择(详细分布见表1)。在做出对这26个方面的满意程度的选择之后,他们要回答“在考虑到生活中的这些方方面面之后”,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是哪一等。

为了解个人在选择满意程度时可能出现的短暂性、流动性和情绪化,我们考虑用问卷所设计的提问顺序来凝固情绪的短暂性;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考虑到个体对其总体生活的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估会受到生活中各个层面满意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要求问卷回答者最终回答对总体生活满意程度之前,我们要求他们对所设计的这26个方面先作出回答。这些应答包括个人对其经济收入、就业状态、职业升迁、社会地位、福利保障、家庭生活以及宏观政策对个人(家庭)影响的满意程度。在后期的实证分析中,我们用多元回归模型(最小二乘法)把个人对不同方面的满意指数与他们的总体满意指数作出

表1 本文所设定不同方面的满意指数分布

(%)

对下列方面有多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未回答
对生活总体	1.03	38.89	42.10	11.55	3.31	3.12
收入方面:						
自家目前人均收入	2.08	28.30	39.89	18.81	9.72	1.20
与认识人家收入相比	1.29	33.20	40.09	16.40	6.32	2.70
与自家过去收入相比	1.68	42.24	34.83	14.22	5.71	1.32
职业与社会地位:						
目前的职业	5.40	48.90	24.28	7.83	3.57	10.02
目前的社会地位	1.86	41.01	32.04	15.58	5.69	3.82
取得的成就	1.20	27.71	39.49	17.45	5.75	8.4
机会与社会流动:						
职业晋升	0.59	18.25	37.08	17.86	5.35	20.87
才能的发挥	0.99	25.59	41.79	16.54	4.44	10.65
培训机会	1.00	25.46	31.52	15.70	4.92	21.40
工作稳定	1.39	41.76	25.03	12.84	6.01	12.67
福利方面:						
老年的经济保障	1.82	33.34	31.59	14.15	7.74	11.35
目前的住房条件	2.91	37.54	34.63	15.88	8.51	0.53
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1.40	35.74	32.93	17.57	5.16	7.2
宏观政策与环境						
总体政策对自家的影响	1.76	42.27	34.83	8.70	2.61	9.82
食品(米面)价格	2.57	73.12	18.08	3.27	0.59	2.37
基本日用品(含衣物)价格	1.56	54.96	32.64	6.98	1.32	2.54
所居住城市的基础设施	1.39	37.07	38.72	15.11	5.62	2.09
对污染的控制	0.97	17.78	44.50	23.29	10.61	2.85
家庭与社会联系:						
自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	1.38	51.42	30.98	5.69	1.10	9.44
家庭生活与婚恋关系	9.46	69.45	11.54	3.11	0.90	5.54
配偶的收入	2.32	33.08	31.79	16.83	7.44	8.54
配偶的职业	4.06	43.33	23.68	12.18	4.80	11.95
配偶的社会地位	2.24	41.37	27.85	13.59	5.00	9.95
配偶的成就	1.85	34.66	32.67	13.88	4.39	12.55

注:观察值为6976。

数据来源:观念2002。

相关分析,用不同方面的满意指数对总体满意指数的相关系数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方面满意指数对总体的贡献。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能够代表中国城市的样本人群对他们生活总体满意程度的评估来体现群体的、社会的稳定性。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很难去参与游行、示威,或诉诸武力行为以及去犯罪(Gissinger and Gledisch, 1999; Huntington, 1968)。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愤慨不满的人们,这个社会亦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Diener, 2000; Frijters, 2000)。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我们所使用的“不满意”类同于许多研究中所使用的“幸福”或

“满意”指数(详见 Layard, 2005),唯一不同的是对稳定性研究的命题使我们更侧重于满意衡量尺度的底端。

(二) 对总体满意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设立本文所要验证的假设

确定了所要分析的总体满意指数(模型的左边变量)的内涵之后(见上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计量经济模型来研究决定总体满意指数的各种因素;我们尤其对社会经济因素感到兴趣。然而,为了得到准确的结论,所有可以观察到的变量,即便不是经济或社会变量,只要它们对总体满意指数具有影响,我们也会在模型中对它们进行控制。

满意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受到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先天性格、遗传心理基因的影响。在建立分析对满意度的决定因素的模型时,我们设计了与此相关的变量,企图能在模型中控制这组变量。本文对性格的界定是一个经过因素分析加权的指数。这个指数反映出个人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反应。同时,我们也对普遍使用的反映个人特征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等其他社会指标在模型中进行了控制。

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经济收入会给人带来满意感,高收入则带来高满意感。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对截面数据或是对面板数据所做的分析),收入与满意(幸福)指数多倾向于正比关系(Easterlin, 2001; Frey and Stutzer, 2002; Layard, 2005)。

本文要验证的最重要的一组假设也是关于收入的。首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会否引起社会中不满人群的比例上升,从而会增加社会动乱的可能。经济增长是否会降低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均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里我们假定,只要各个收入组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收入的增长,尽管高收入组的增长高于中低收入组,在收入能持续上升的情形下,中低收入组对与高收入组之间的增长差距(相对收入)未必会产生太大的不满。1988年到2002年,中国城市家庭的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上升4.47%。如果只关注近期的发展,1999年到2002年之间,家庭年均收入增长率为4.42%。

就业状态与就业机会是另一组我们认为会影响满意指数的变量。1997年开始推行的中国城市国有企业的改制使部分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或分流(Knight and Xue, 2003; Appleton *et al.*, 2002)。然而,中央政府在此期间同时推出了缓解下岗或改制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的政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岗补助”,后来改为“失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等。尽管大多数失去永久工作的劳动力集中在城市的低收入组,但真正能够领取“失业救济”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还是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他们在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所获得收入超出政府所颁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尽管并不固定)也使他们失去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Kim, 2006)。在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中,24%的应答者在1998至2002年之间的某一个时间点经

历过收入的下降。这种过去的经历可能会引起长久的不安全感,乃至不满感。这与收入的平面效应对满意指数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定义的就业概念包括“非正式就业”,即只要劳动者经济活动行为带来收入,不管这些活动多么不固定,我们依然界定这些活动为就业,而非失业。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内涵产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的升迁与失落在这些年的演变中不仅反映在职业的变动中,也反映在人们主观的认同中。职业,作为客观标识,与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在群体中的主观标识究竟是否一致?我们对此亦作了检验。

身份权利(entitlement)与福利的提供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城市户口带给城市户口的所有者一系列福利,农村户口的持有者无法享受(Knight and Song, 1999)。改革开放迄今,这种户口制度在实质上受到了挑战,其经济的有形价值也在日益下降。没有城市户口的进城农民工逐渐在大中城市落户,就业;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企业部门的职工在下岗分流后亦开始在非正规部门寻找职业;更重要的是,城市职工以往由单位所提供的福利已经在很大比例上转为个人承担。

目前最有争议的福利项目是医疗保健制度。在我们的问卷中,有关医疗费用的来源被用来作为中国福利政策对满意指数的一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项有关福利提供的指标牵涉到住房产权的转移。众所周知,国有企业职工在住房改革之前(福利房分配之前)享受着几乎是免费的住房。福利分房是以职工的工龄、职别与贡献指标进行,许多具有长期工龄的城市职工,或者具有高级职称的员工以相当低的成本“购得”与其身份相当的住房。在我们2002年的样本中,79%的家庭拥有其住房的财产权。我们假设对房产的拥有会提高对制度总体的满意指数。反则亦反之。

政治组织的隶属(affiliation)与政治参与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含义。组织的隶属是以党派的成员资格而确定的。(Appleton *et al.*, 2006; Morduch and Sicular, 2000)。本文对政治参与的界定是一个经过因素分析加权的指数。这个指数反映出个人对政治时事、社会事务等重大事情的兴趣程度。共产党员并不一定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指数,而非党员也有相当高的参与意识。

另外一个重要的对满意指数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个人的家庭生活与家庭的关系网络。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个人的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许多经济活动都是在家庭生活中得以体现的。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程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而提高。在计划体制下,单位(城市)硬性地代替了家庭的许多经济功能,城市职工家庭生活的同质性相当强,而且他们与单位或国家所提供的福利亦相当清晰。因此,无论是个人或家庭的关系网络在当时都不可能具有差异过大的经济价值。

市场机制引进之后,单位或国家与其职工(及其家庭)的关系产生了更

大的异质性,例如更多的利益群体出现在同一体制内、私营部门的兴起、半市场半计划对各种经济要素的控制与侵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关系网络成为了人人无法不依赖的软体社会结构。

本文还假设,当政府与单位对依赖性很强的城市职工取消了以往的无条件的福利(就业)保障时,市场所能提供的福利机会由于市场的被干预与不完善,对不同的个人是不平等的。在市场与政府的空隙中,一个强大的个人关系网络正在形成;个人的家庭功能又逐步开始取代单位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家庭理念在中国城市开始复苏。与之相衍生的关系网络在保障个人生存与发展时作用亦日益扩大。

三、方 法

本文采用了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第一个多变量 OLS 模型用来验证本文所设计的(见前文)26个不同方面的满意指数与总体满意指数的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模型中每一个方面的满意指数系数(coefficients)作比较,得出比较。在控制了其他方面满意指数的条件下,系数值愈大(同时统计检验显著),就说明这个方面的满意指数对总体满意指数的相关(贡献)则愈大。

第二个所采用的计量模型是 Ordered Probit 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左边的变量是“总体满意指数”,在等号右边的解释变量为我们在第(二)节所讨论的那些假设。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尽管第二个模型较第一个模型而言,分析性要更强一些,但有若干计量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尚未能解决。在决定满意指数的变量中,收入与就业与满意指数之间的内生性(endogeneity)由于缺乏合适的工具变量而无法得以调整。因此收入、就业与满意指数的因果关系则难以成立。在对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结果进行解释时,我们并不对模型的系数进行诠释,而是通过这些系数来获得不同变量(决定因素)对总体满意指数的估计概率值。以此来显示不同因素对总体满意的量化重要性。

这个模型的公式如下:

$$S_i^* = a_i + b_{ni} \cdot X_{ni} + u_i, \quad (1)$$

S_i^* 是一个 latent 变量,代表总体满意指数。在这个 Ordered Probit 模型中,模型左边变量是由个人所报告的满意程度($S_i = j$ where $j = 0, J$),如果这个 latent 变量被人为划分其值之后则成为 μ_j , 其估计值可以在公式(2)中得出:

$$\Pr(S_i = j) = \Phi(\mu_{j+1} - \beta X_i) - \Phi(\mu_j - \beta X_i), \quad (2)$$

在这个公式中, $\mu_0 = -\infty$, $\mu_1 = 0$ 同时 $\mu_{J+1} = \infty$ 。

在公式(1)与(2)中, X_n 均是一个向量,代表着这个模型所有的解释变量(包括我们所要验证的各种假设)。

四、总体满意指数以及其所涵盖的诸种方面

(一) 总体满意指数的国际比较

图1显示了总体满意指数在这个样本中的分布。2/5的应答者是满意的(其中1%为非常满意)。在主度量尺的另侧,15%的应答者是不满意的,其中非常不满意的为3%,三倍于非常满意的人群。这些数字如果不做一点国际比较,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下面我们从Frey和Stutzer(2002)的研究中挑选出几个国家或地区,把我们中国城市的满意指数置于其中,以供比较(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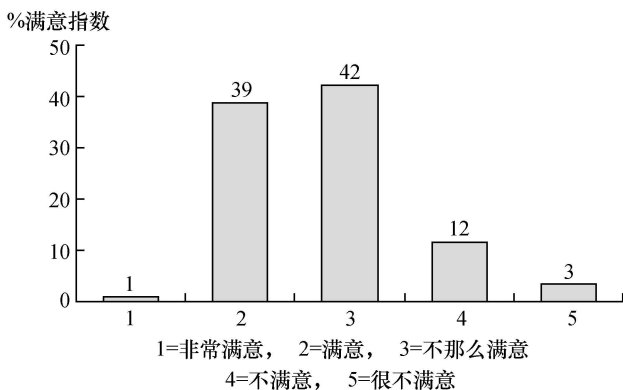


图1 满意指数的五等尺度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的平均满意指数6.47处在中位。除了日本之外的OECD国家都比中国有着较高的满意指数。转型中的国家,如俄国与乌克兰则有着最低的满意指数。

表2 不同国家(地区)满意指数的比较

国家或地区	平均满意指数	国家	平均满意指数
尼日利亚	6.82	俄国	4.45
南非	6.08	乌克兰	3.95
巴西	7.15	丹麦	8.16
秘鲁	6.36	瑞士	8.02
中国台湾地区	6.89	瑞典	7.77
韩国	6.69	美国	7.67
印度	6.53	澳大利亚	7.58
		英国	7.46
中国	6.83 (1995)*	法国	6.78
中国	6.47 (2002)**	日本	6.61

注释:(1)*引自Frey and Stutzer(2002);(2)**表示作者对数据(观念2002)所作的计算;(3)指数表现在从1到10的量尺上。1=最低满意指数,10=最高满意指数。

数据来源:选自Frey and Stutzer(2002)。

(二) 对满意感诸种内涵的分析

在这一节, 我们来解释从本文的第一个模型(最小二乘法)所获得的结果。在最小二乘法的分析中,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模型得出总体满意水平与所观察到的对生活的不同方面满意水平的关联(association)。模型总体可解释的能力为 37% (调整后的 R^2); F 值为 172.57; 进入分析的样本观察值为 6 977。在下面的分析中, 我们对本文在开始时所提出的几种假设作出验证后的解释(见表 3)。

表 3 对生活总体满意程度与其他所选定方面的多元回归函数分析
(等式左边变量: 对生活总体满意的指数)

等式右边变量: 为下列生活其他方面满意的指数	系数	T-统计值	
关于收入的方面:			
目前的家庭人均收入	0.083	5.95	***
与认识的其他家庭的目前收入相比	0.075	5.78	***
与自家过去的收入相比	0.157	10.48	***
职业与社会地位:			
目前的职业	-0.008	-1.01	
目前的社会地位	0.049	4.35	***
所取得的个人成就	0.107	10.59	***
机会与社会流动:			
晋升的机会	0.00005	-0.01	
发挥才能的机会	0.088	9.75	***
得到培训的机会	-0.026	-3.65	***
工作的稳定	-0.008	-0.92	
福利方面:			
老年的经济保障	0.016	2.28	***
目前的居住条件	0.116	9.23	***
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0.000	0.05	
宏观政策与环境:			
国家总体政策对自家的影响	0.028	3.55	***
食品(米、面)价格	0.073	5.12	***
衣物与日用的价格	0.033	2.45	***
居住城市的基础设施	0.065	5.37	***
污染的控制	0.0004	0.04	
对污染的控制			
家庭生活与社会联系:			
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	0.022	2.7	***
对家庭生活与婚恋关系	0.030	3.45	***
配偶的收入	-0.002	-0.18	
配偶的社会地位	-0.020	-2.04	***
配偶的成就	0.058	6	***
配偶的成就	0.025	2.22	***
Intercept	0.032	0.57	
调整后的 R square	0.371		
F 值	172.57		
观察值	6 977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为: 观念 2002。

1. 不同收入满意水平与总体满意水平的关联

在测定这组假设时,我们设计了对三个不同的收入指标,试图通过它们在模型中的相关系数的大小来测定对总体满意水平的分别贡献。第一个是对即期的家庭人均收入的满意水平(绝对收入);第二是对(即期)所知的人群的收入作比较时的满意水平(相对收入,即对收入不平等的测定);第三是对自己目前收入与过去收入相比较时所得出的满意水平的比较(收入的增长)。由表1可以看出,人们对上述这三个与收入有关的满意水平低于总体的平均满意水平(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加总之后)。从对这几个收入变量满意水平做出简单描述的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44%的应答者对家庭收入的增长是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与之相比,34%表示对相对收入满意或者非常满意;30%对绝对收入表示满意。

从最小二乘法所得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在收入控制了其他方面满意水平的条件下,这三个指标都有着相当统计显著性,并且有着最大的系数(coefficient)。然而在对这三个系数作出比较时,收入增长满意水平的系数(0.157)近乎其他两个收入变量的两倍。相对收入满意水平(检验收入不平等之不满的假设)的系数为三个系数中最低的(0.075),对绝对收入满意水平的系数为0.083,略高于前者。

这个模型的结果表明,收入对总体满意水平的解释性(相关性)为最强。然而相对收入不满与对生活不满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那么骇人听闻。收入增长的持续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除由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负面的社会不满心理。然而对即期收入的不满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参见消费理论的非饱和性公理)。

2. 职业与社会地位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用职业分类来代表客观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而以“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代表应答者对自己在社会中位置的主观判断。这是因为,我们的模型所分析的不是一个经济指标(如收入或工资),而是对生活总体的(主观的)满意水平。

经济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人们的心理上的反映亦很强烈。比如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厂长职务曾经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恐怕已是今非昔比了。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应答者分别考虑并对职业与主观社会地位的满意水平做出判断。在表1中,55%的应答者对职业表示满意,43%的应答者对主观社会地位表示满意。然而在模型中,当其他变量被控制住时,对职业的满意水平与总体满意水平则呈负相关,并且没有统计显著性。而(主观的)社会地位则与总体满意水平呈正相关(0.049),显著性很强,为0.01%。

在这组假设中,我们还对个人成就的满意水平作了相关分析。从简单的描述来看(表2),只有不到29%的应答者对个人成就表示满意。然而在模型

中,个人成就满意水平对总体满意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07,统计显著性很强。这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或许验证了成就感可以提高人们对生活总体的满意水平。

3. 机会与社会流动

成就的取得通常与对机会的捕捉呈正相关。而对机遇的恰当运用,可以使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正向流动。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把客观机会分为职业的升迁与培训。失去工作是一个负向的流动,对此的恐惧应当会大大降低总体满意水平。而充分发挥才能是社会正向流动的表现。于是这两个指标被用于指定社会可能流动的正负两个方向。

表1显示:略低于1/4的应答者对职位升迁满意;略低于1/3的应答者对培训机会满意;43%的应答者对职业的稳定性表示满意。这个比例高于我们的预期,然而6%的应答者对“工作稳定”的极为不满,可能反映出下岗或失业人群在总体劳动人口中的比例。28%的应答者对自己的才能得以发挥感到满意。在模型中(表3),只有“才能得到发挥”与总体满意水平呈正相关,并在统计上意义显著。对职业培训不满会减弱总体满意感。这可能反映的是那组在非营利企业的、低技术企业从业的人群。

4. 福利与社会服务

在问卷中,我们要求应答者对居住条件、交通、老年的经济保障做出满意水平的选择。同总体满意水平相比,对这三个指标的满意水平都偏低(表1)。在回归分析中,老年经济保障与总体满意水平呈正相关并有统计显著性(其他情况相同时)。然而这个系数值是模型最小的。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在模型有着相当大的系数(0.116),仅次于“收入增长的满意水平”,对整体满意水平做出第二重要的贡献。

5. 宏观政策

政府制定的政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满意水平。Di Tella *et al.* (2001)通过对欧洲12个国家及美国的研究发现,人们对通货膨胀与就业政策十分敏感。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低的国家,幸福指数则高。

在我们的研究中,对通货膨胀、控制污染、城市基本建设的满意水平被用来作为对政策评估的指标。然而,由于我们的数据的本质是截面而非面板(panel),对价格的满意水平的反映仅仅针对居住成本(living cost),而并不捕捉价格的变化,故而无法对政府的货币政策做出一般的判断。

在我们的样本中(见表1),76%的应答者对主要食品、57%的应答者对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是满意的。38%的样本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或结构表示满意,而仅有19%的应答者对污染的控制满意,相反高达34%的应答者对此政策不满或极为不满。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模型中(表3),当其他变量被控制之后,对控制污染政策的满意系数却完全没有统计显著性,即它对总体满意水平几乎没有影响。当问到政府总体政策对应答者家庭的影响的满意水平时,44%

的应答者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然而在模型中，该系数则低于对食品价格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满意水平。

6. 社会网络（关系网）与家庭

本研究所设计的有关家庭的层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配偶的各种状态与社会关系。80%的应答者对家庭生活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53%对自家拥有的社会网络表示满意（均见表1）。在模型中（表3），这两个变量都与总体满意程度为正相关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然而其系数则相对偏小（0.022与0.030）。与对配偶的职业与收入相比较，对其社会地位与成就的满意程度（在模型中）与总体满意水平则为正相关关系（配偶社会地位的系数0.058；配偶成就的系数0.025）。

（三）不同满意水平的分解（decomposition）

在这里我们对最小二乘法分析中（结果见表3）不同方面满意程度（右边变量）对总体满意程度（左边变量）的不同贡献做出分解。表4中第一行的数字为各种方面满意程度的平均值。第二行是用第一行的各个平均得分减去总体满意水平的平均得分：3.24。第三行是用第二行的与总体满意水平均值的差乘以从表3（最小二乘法）的各个满意水平相应的系数，即它们各自对总体满意水平的贡献值。

表4 对总体满意指数内涵的分解

对如下不同方面的满意指数：	[1] 平均指数	[2] 与总体满意指数的差	[3] 与总体满意指数的差的贡献
总体满意指数（在1与5之间）	3.235	N. A.	N. A.
收入：			-0.042
目前家庭人均收入	2.941	-0.294	-0.024
与认识家庭人均收入比较	3.069	-0.166	-0.012
与自家过去收入比较	3.202	-0.033	-0.005
职业与社会地位：			-0.028
目前的职业	3.497	0.262	-0.002
目前的社会地位	3.185	-0.050	-0.002
所取得的成就	3.013	-0.222	-0.024
机会与社会流动：			-0.013
职业晋升	2.885	-0.351	0.000
才能得以发挥	3.024	-0.211	-0.019
培训机会	3.024	-0.211	0.005
工作稳定	3.215	-0.020	0.000
福利方面：			-0.018
年老后的经济保障	3.083	-0.153	-0.002
目前的住房条件	3.105	-0.130	-0.015
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3.115	-0.120	0.000

(续表)

对如下不同方面的满意指数:	[1] 平均指数	[2] 与总体满意指数的差	[3] 与总体满意指数的差的贡献
宏观政策与环境:			0.043
国家总体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3.353	0.118	0.003
食品(米面)的价格	3.756	0.521	0.038
基本日用品(衣物等)的价格	3.497	0.262	0.009
居住城市的基础设施	3.138	-0.097	-0.006
对污染的控制	2.745	-0.490	0.000
家庭与社会联系			0.023
家庭的社会关系	3.511	0.276	0.006
家庭与婚恋关系	3.884	0.648	0.019
配偶的收入	3.066	-0.169	0.000
配偶的职业	3.337	0.102	-0.002
配偶的社会地位	3.247	0.012	0.001
配偶所取得的成就	3.180	-0.056	-0.001

注释:[2]=[1]减去总体的满意指数(3.24);[3]=[2]乘以表3中相关的系数。

数据来源:观念2002。

当把这些个别贡献值按分组加总,我们可以以不同假设分组的总贡献值来判断其对总体满意水平的贡献。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发现对总体满意水平(5等量度)最大贡献的是样本对政府政策的满意值(0.043),然而这其中,对主食的价格的满意程度则占据主导地位。居第二位的是家庭与社会关系那一组,该组的综合贡献值为0.023。相反,收入、社会地位、机会与福利等假设组则对总体满意水平起着负贡献。它们的贡献值分别为-0.042,-0.028,-0.013和-0.018。因此,在考虑对总体满意度相对应的均方差与系数(coefficients)之后,主食价格与家庭关系显然对总体满意水平有着明显的正向贡献。

五、决定不满情绪的社会经济因素

本节解释所采用的第二个计量经济学模型(Ordered Probit)所获得的结果。模型的左边变量为以5等度量尺度(5 point scale)记分的总体满意水平,即 S_{ij} ($j=0, j$)见公式(1)和(2)。模型的建立,即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可详见本文的第二(二)节。表5提供了从Ordered Probit模型中估计出的决定总体满意水平因素的参数值。表6则把这参数值算成估计(predicted)的概率值,可以更好地用来解释总体满意程度。

表5 对总体满意指数的因素分析: 中国城镇的 Ordered Probit 回归

变量	均值或比例	Coefficient	Robust T-value	sig.
曾经历过收入下降(0,1)	0.2408	-0.1207	-3.66	***
对数化的家庭人均收入	8.2816	0.1723	9.44	***
目前有工作	0.0226	-0.2771	-2.82	***
个人特征:				
年龄(年)	42.7005	-0.0668	-9.64	***
年龄 ²	2105.82	0.0009	11.97	***
男性	0.4155	-0.1765	-5.84	***
独身未婚	0.0266	-0.3983	-4.86	***
离婚	0.0146	-0.2450	-2.19	***
丧偶	0.0234	-0.2650	-2.72	***
性格:合群	0.2554	0.4992	15.54	***
自我表述的健康状态:				
相当健康	0.3732	-0.1303	-3.42	***
一般健康	0.3122	-0.2867	-7.18	***
不健康	0.0516	-0.3668	-5.35	***
很不健康	0.0044	-0.9910	-4.30	***
医疗保险:				
有大病保险	0.3406	-0.0860	-2.40	***
自购医疗保险	0.0155	-0.1259	-1.11	
无任何医疗保险	0.2782	-0.2938	-7.35	***
与政治有关的因素:				
关心政治与社区	0.3060	0.1664	5.36	***
参加其他政党	0.0126	-0.0852	-0.67	
无任何党派	0.5860	-0.0925	-2.93	***
职业:				
1. 私营企业主或经理	0.0016	0.2471	0.71	
2. 个体户	0.0250	-0.0056	-0.07	
3. 专业人员	0.1390	0.0522	1.07	
4. 政府干部与经理	0.0191	0.1837	1.74	*
5. 中层干部与经理	0.0578	0.1241	1.88	*
6. 办公室职员	0.1552	0.0373	0.84	
7. 技术工人	0.1152	0.0254	0.47	
8. 商业工人	0.0741	0.0147	0.26	
9. 其他	0.0144	-0.0741	-0.64	
户口所在地:				
本地农业户口	0.0087	0.1715	0.99	
外地城市户口	0.0037	0.2985	1.40	
外地农村户口	0.0030	-0.5429	-2.88	***
观察值	6761			
Log Likelihood:	-7200.8895			22
Restricted Log L	-7747.0193			
Pseudo R ²	0.0705			

注:(1) 左边变量为满意值的排序;(2) 模型中作为比较的哑变量为: 目前就业、已婚、性格悲观、很不健康、不关心政治与社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国家医疗保险、户口在本地城市、无技术的体力工人、各省的哑变量;(3) *** 表明统计显著性为1%或更低, ** 表明统计显著性在1%与5%之间, * 表明统计显著性在5%与10%之间;(4) 考虑到可能未观察到的分组层次上的相关性,标准差已经过修正。

数据来源:观念2002和CHIP2002。

表6 决定总体满意值各因素的估计概率值(根据表5计算)

	非常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总体概率(Baseline)	0.6%	39.8%	46.8%	10.6%	2.3%
未经历过收入下降	0.6%	40.8%	46.3%	10.2%	2.1%
经历过收入下降	0.4%	36.4%	48.3%	12.1%	2.8%
对数化的家庭人均收入	0.9%	46.2%	43.3%	8.1%	1.5%
目前有工作	0.6%	40.0%	46.7%	10.5%	2.2%
目前无工作	0.3%	30.1%	50.2%	15.3%	4.2%
个人特征:					
年龄(年)					
=20	0.6%	41.0%	46.2%	10.1%	2.1%
=30	0.3%	32.6%	49.6%	14.0%	3.6%
=40	0.3%	30.5%	50.1%	15.1%	4.0%
=50	0.4%	34.5%	49.0%	13.0%	3.2%
=>60	0.8%	45.1%	43.9%	8.5%	1.6%
女性	0.7%	42.5%	45.4%	9.5%	1.9%
男性	0.4%	36.0%	48.4%	12.3%	2.9%
已婚	0.6%	40.5%	46.4%	10.3%	2.1%
未婚	0.2%	26.5%	50.8%	17.3%	5.2%
离婚	0.3%	31.7%	49.8%	14.4%	3.7%
丧偶	0.3%	31.0%	50.0%	14.8%	3.9%
性格特征:					
正向	0.4%	35.1%	48.8%	12.7%	3.0%
负向	1.5%	53.5%	38.3%	5.8%	0.9%
健康(自我评估):					
非常健康	0.9%	45.8%	43.5%	8.3%	1.5%
健康	0.6%	40.9%	46.2%	10.1%	2.1%
一般健康	0.4%	35.2%	48.7%	12.7%	3.0%
不健康	0.3%	32.4%	49.6%	14.1%	3.6%
很不健康	0.0%	14.1%	47.7%	26.1%	12.0%
政治参与与政治身份:					
对政治与社区事务没兴趣	0.5%	37.9%	47.6%	11.4%	2.5%
对政治与社区事务有兴趣	0.8%	44.1%	44.5%	8.9%	1.7%
共产党/团员	0.7%	41.8%	45.8%	9.8%	2.0%
其他党派成员	0.5%	38.6%	47.3%	11.1%	2.4%
无党派	0.5%	38.4%	47.4%	11.2%	2.5%
医疗保险的类型:					
国家单位保险	0.7%	41.8%	45.8%	9.8%	2.0%
仅有大病保险(自己付一部分)	0.5%	38.1%	47.6%	11.4%	2.5%
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	0.4%	36.6%	48.2%	12.0%	2.8%
没有医疗保险	0.3%	30.6%	50.1%	15.0%	4.0%
职业与社会地位:					
专业人员	0.6%	40.7%	46.3%	10.3%	2.1%
政府干部与管理人员	0.9%	45.6%	43.6%	8.3%	1.5%
中层干部与管理人员	0.7%	43.4%	44.9%	9.2%	1.8%
私营企业所有或经理	1.0%	47.8%	42.2%	7.6%	1.3%
个体户	0.5%	38.5%	47.3%	11.2%	2.4%

(续表)

	非常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办公室职员	0.6%	40.2%	46.6%	10.5%	2.2%
技术工人	0.6%	39.6%	46.8%	10.7%	2.3%
商业工人	0.5%	39.3%	47.0%	10.8%	2.3%
无技术工人	0.5%	38.8%	47.2%	11.1%	2.4%
其他	0.4%	36.1%	48.4%	12.3%	2.8%
户口所在地:					
本地城市	0.6%	39.7%	46.8%	10.6%	2.3%
本地农村	0.9%	46.1%	43.3%	8.2%	1.5%
外地城市	1.3%	50.8%	40.3%	6.6%	1.1%
外地农村	0.1%	21.7%	50.7%	20.4%	7.1%

注: 本表的概率是以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为均值时作出的计算。

让我们首先考虑高于收入与就业的假设。在这个模型中, 我们用了两个与收入有关的变量, 第一个是对数化的家庭人均收入; 第二个为虚拟变量, 是否在过去五年中个人收入经历过下跌 (0 为没有经历过, 1 为有过经历)。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分析截面数据时得出: 收入与满意度、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 being) 呈正相关关系。我们的数据亦相同。图 2 标识出以收入十等分组后的满意平均值。除了最低收入组以外, 收入的分组与他们的满意值呈标准的线性正向分布。收入越高, 满意程度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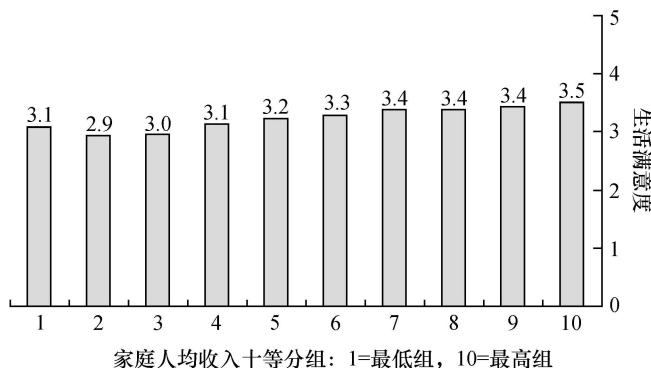


图 2 按收入分组的总体满意指数

与之相对的是在这个多变量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中, 对数化了的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数也是正向的, 并且有统计的显著性。事实上, 这个变量在决定总体满意水平的所有变量中是最为显著的。它意味着, 在其他条件相等时, 家庭人均收入翻一番, 所估计出的总体满意的概率会从 40% 上升到 47%。此外, 我们还发现, 假如在近几年中经历过收入的下降, 所估计出的满意与非常满意的概率则从 41% 下降到 37%。

根据这个模型的估计, 失业至少在三个方面会对整体满意程度起负面效

应。第一,失业会减少家庭收入。第二,失业倾向于将收入置于向下滑行的轨道。第三,在模型中控制了收入之后,真实的或单纯的由就业引起的对满意感的效应则可以估算出。在这个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由于失业所产生的不满的概率从13%上升到20%。

下一步,我们来分析健康对总体满意程度的影响。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分为5个点度)在模型中为虚拟变量(其中“非常健康”为参照组)。“非常不健康”在模型中的绝对系数非常之大,而且其满意的概率值才14%;相比之下,健康两组的满意概率则为47%,大大高于前者。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健康与满意之间会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好的情绪会增强人体免疫力。然而人们通常更倾向于从另一个方面分析问题,即有病则无法工作,从而则没有收入,陷入经济窘境。与疾病和健康相关的分析是,模型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不满概率仅为19%,与之相反,由国家承担医疗保险则降至12%。对这一组变量的概率估计,可能反映出人们对疾病风险的焦虑。因此,对医疗保险的政策选择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总体满意程度。

在我们对稳定性的这一模型中,当其他条件相等时,中国女性比男性对生活更为满意。她们的总体生活不满意概率低于男性(男性的不满意概率为15%,女性则为11%,见表6)。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女性比男性对生活要更满意然而她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却常常位于劣势?对她们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工资与就业方面(Li and Gustaffson, 2000; Knight and Song, 2006; Appleton *et al.*, 2005)。Song (2006)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她发现在中国城市劳动力样本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与就业方面倾向与屈从于男性。大多数女性以家人的满意为满意,家人的幸福为幸福。这究竟是封建意识对她们的影响还是“利他主义”的作用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在模型中,按年龄分组的概率与总体稳定性呈正U结构。年少与年长者的满意概率都高于其他年龄组。47岁时的概率值为最低,从此之后则开始上升。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到,对40岁组所估计出的不满意概率为19%,而20岁组的则为12%,60岁组的为10%。结婚可以提高人们总体的满意概率。当其他条件同等时,单身未婚者的不满意概率为23%,而已婚的人则仅为12%。尽管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许是可以倒置的,即,性格开朗易于满足的人容易和人组成家庭,反则,亦可反之,我们依然认为模型所呈现出的婚姻与满意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对现实的确还具有一定的解释性。这一点亦可以从丧偶人群的较低满意度与未婚人群的颇为相似得到揭示。

六、结 论

通过个人对其生活总体满意程度的评估,并用之与国际社会相比较,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还不至于像某些媒体炒作的那么严重。在样本中,只有

12%的人群表示不满, 3%表示非常不满, 而40%的人群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然而, 由于总体满意指数对某些特殊政策的满意指数十分敏感, 加之又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配套, 我们依然不能对中国社会是否长期稳定持完全乐观的态度。不过, 通过具体分析, 现实中的大型过激事件多与产权(如对土地、国有资产的利用与分配)有关(Institute of Directors, 2006), 小型案件则与产生不公正的体制有关(详见 Song, 2006)。社会公正是需要法制为保障的, 从此意义而言, 体制的最终改革是导致社会基本稳定的保障。

本研究对一个普遍的共识进行了科学的验证。我们发现, 所谓的收入不公平并不会简单地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 确切地说, 收入的增长可以降低社会的不稳定性。经济增长会增加就业, 就业会带来收入。人们还不至于把邻居的收入比自家要高当作去拼一死活的指标。具体而言, 我们发现, 对所有三个与收入有关指标(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收入增长)的满意指数都对总体稳定指数有很大的相关性。然而, 在控制其他条件后, 收入增长对社会稳定具有最高的贡献; 相比之下, 相对收入(用来测定收入差距与稳定性的关系)的贡献则小得多。这就是说, 与2002年相当的收入差距并不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对收入不公的不满也不是那么危言耸听。

失业或曾经有过收入下降的经验对总体稳定性会产生负作用。中国的城市劳动人口习惯于依赖政府或单位。一旦依靠不再可靠, 从内心产生的不安全感便会导致不稳定心态。然而, 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普遍问题, 人们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规律, 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和竞争能力。同时, 中国家庭在分担经济风险, 提供对家族成员(extended family members)的互助(social support), 以及对社会网络的分享方面,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在满意度的分解中发现, 对家庭生活和其社会关系的满意是人们对总体满意指数的主要内涵。

公共政策, 尤其是涉及人们基本生活的政策(衣、食、住、行、医), 是测定满意指数或社会稳定性的晴雨表。保持基本商品价格不大起大落或许对低收入组的稳定有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在没有完善的货币与金融体制作为调控手段的情况下, 政府过多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只会引起供需的不平衡。全面完善对最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 应该开始适当考虑建立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的建立可以使最低收入组与社会平均收入接近, 让最穷的人群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得到与平均收入挂钩的稳定收入。通过政策设计, 提高最低收入人群的市场竞争力的各种培训也应当引起政府的注意。只有在人人都可过上像样的生活时, 社会的长期稳定才会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政策底限, 这才是对公平, 而非对平均主义的追求。

在这个研究中, 我们还得出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对时事和社区的关心可以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如果我们把这种关心看作一种政治参与意

识,是否可以认为允许更多的人去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社区决策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满意指数呢?这个发现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相当接近:关心与参与可以使人们增强对自己的信心,从而得到满足。同时,关心与参与可以成为一种宣泄机制:大家可以在不断地骂骂咧咧中得到满足,而不会去付诸暴力实践。可见,近些年来中国的政治宽容已经开始产生良好的社会稳定效应。

最后一个在此值得一提的发现是:我们应当对“家庭”重新认识。过强的家庭传统或许使中国女性丧失女权意识,然而,家庭像甜蜜的麻醉剂,她缓解着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产生的种种弊端,她可以让人们在没有工作、没有金钱的情况下,饥有所食,疾有所疗,缺有所补。家是人们的避风港,她让我们在市场的激流勇进中尚可安存。问题是,这个家还能维持多久?一个以国代家的福利体系假如真会产生,会让这个社会得到和谐与稳定吗?

参考文献

- [1] Appleton, S., J. Knight, L. Song, and Q. Xia, “The Econom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the Curious Case of Rising Number and Wage Premium in Urban China”, Mimeo, Nottingham University, 2006.
- [2] Appleton, S., L. Song, and Q. Xia, “Has China Crossed the River? The Evolution of Wage Struc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4), 644—663.
- [3] Appleton, S., J. Knight, L. Song, and Q. Xia, “Contrasting Paradigms: Segment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4, 2(3), 185—206.
- [4] Appleton, S., J. Knight, L. Song, and Q. Xia, “Labor Retrench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2—3), 252—276.
- [5]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34—43.
- [6] Di Tella, R., R. MacCulloch, and A. Oswald, “Preference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1), 335—341.
- [7] Dockery, A., “Looking Inside the Unemployment Spell”, *Australia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4, 7(2), 175—198.
- [8] Easterlin, R.,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3), 465—484.
- [9]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hina: country profile*, 2004, <http://www.economist.com/countries/China/profile.cfm?folder=ProfilePolitical%20Forces>
- [10] Frey, B., and A. Stutzer,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Human Well-being*. New Jersey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 Frijters, P., “Do Individuals Try to Maximize Gener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0, 21(3), 281—304.
- [12] Gissinger, R., and N. Gledisch, “Globalization and Conflict: Welfare, Distribution, and Political Unrest”, *Journal of World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999, 5(2), 327—365.

- [13] Goldthorpe, J. , and K. Hope, *The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 A New Approach and Sca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 [14] Huntington, S. ,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5] Institute of Director, UK, "International Insight for Business—China: 6 September", 2006.
- [16] Kim, B. , "The Urban Livelihoods of the Laid-off Unemployed in China: Asset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Sustainability", PhD thesis, Nottingham University, 2006.
- [17] Knight, J. , and J. Xie. "How High Is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6, 4 (2), 91—107
- [18] Knight, J. , and L. Song, *Rural-urban Divide: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 Knight, J. , and L. Song, "Increasing Urban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Extent, Elements and Evalu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3, 11 (4), 1—23.
- [20] Knight, J. , and L. Song, *Towards a Labor Market in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1] Layard, R. ,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2005.
- [22] Li, S. , and B. Gustafss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0, 13 (2), 305—329.
- [23] Liang, J. , "Where is the Way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New Century Net, 10/24/2005.
- [24] Liu, J. , "Crime Pattern Transition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5, 45 (5), 613—633.
- [25] Morduch, J. , and T. Sicular, "Politics,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Does It Pay to Join the Par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7(3), 331—356.
- [26] Pei, M. ,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2002, 81(5), 96—110.
- [27]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gal Statistic Yearbook*. Beijing: China Fazhi Publication House, various years.
- [28] Saunders, P. , and X. Shang,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1, 35 (3), 274—289.
- [29] Song, L. , "Policy Initiatives on Inequality in China", Report commissioned by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K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the Project "Policy Initiatives on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nd Inequality", 2002.
- [30] Song, L. , "Does Inequality Matter in China: an Empirical Enquiry", Mimeo, Nottingham University, 2006.
- [31] Tanner, M. ,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 27 (3), 137—156.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Social Discontent in Urban China

LINA SONG SIMON APPLETON
(*Nottingham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social discontent by using survey respondents' assessments of their own levels of satisfaction. The data comes from a national-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7 000 individuals randomly sampled. Our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and with it, employment creation—may be sufficient to ward off large scale social discontent and hence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urban China. This reinforces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depends on China's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Among other factors which might assist in alleviating social discontent are being politically active, having strong social networks and good family relationships. Memb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lso found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satisfa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I31, I38, J18, D63